

第七章

九世班禅喇嘛返藏问题：

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分别治理制度的延续问题

这里来分析九世班禅喇嘛返藏问题，它涉及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分别治理前后藏之制是否还能延续下去的问题。虽然学术界对班禅返藏问题作了一些探讨^[1]，但是尚须从九世班禅喇嘛本人的努力以及中英两国和噶厦三方之间交涉与较量的角度，对该问题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节 九世班禅喇嘛出走内地之因：达赖、班禅分别治理前后藏问题

要研究九世班禅喇嘛返藏问题何以成为民国时期西藏三大问题之一，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有学者分析了九世班禅喇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的根源，在于八世班禅喇嘛作为格鲁派的领袖，却研习萨迦派教义，导致噶厦不满。并分析认为失和的症结在于：(1)“英帝国主义覬覦西藏，早存吞并蚕食之心，极尽拉拢、离间、调唆之能事，是导致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2)“清末驻藏大臣的错误施政，加深了两佛主之间的矛盾”；(3)“两佛主手下官员，相互构馋，使得本已不睦的两佛关系火上浇油”。^[2]其实，这些虽然是原因，但并非根本症结。根本症结在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及分别治理前后藏的制度在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背景下能否继续维持下去的问题。

英国政府曾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间失和过程作了概括，说：“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这两位喇嘛间的政治竞争愈演愈烈，似乎来源于英国1904年进驻拉萨和1910年中国进驻拉萨。当十三世达赖喇嘛1912年从印度返回

拉萨时，中国努力用班禅作为其亲华的竞争者。几年以后，拉萨和日喀则间在封建赋税和领地裁定方面不断争吵，1924年班禅带着大批随从逃到中国内地。”^[3]这基本上反映了双方失和的三个阶段、原因与结果。

一、英国入侵背景下的九世班禅喇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的变化

1888年2月26日，由驻藏大臣文硕主持金瓶掣签，5岁幼童仓珠嘉措抽中为九世班禅喇嘛，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剃度并取法名为曲吉尼玛。1902年5月22日，九世班禅喇嘛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比丘戒，是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徒弟。这恰恰是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到即将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的时期，两个系统之间关系的加强有利于共同应付挑战。1903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九世班禅喇嘛“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主动向达赖喇嘛提出由班禅拉章承担四分之一的抗英军费”，并派出200名僧兵参战，双方“同心协力，发动全藏僧俗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军”。^[4]

与此同时，在清政府边疆大吏的奏折中多次出现“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5]、双方如同水火的报告。1882年，年满6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受沙弥戒，理应由其师傅八世班禅喇嘛来授，但噶厦拒绝邀请八世班禅喇嘛，而由摄政第穆活佛来主持受戒。这显然破坏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之制。1902年九世班禅喇嘛虽然前往拉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却“由布达拉前击鼓而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怒谓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尊）大，遂罚银一千五百两”。^[6]英国方面的材料也显示九世班禅喇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存在着权力之争。1905年5月9日，九世班禅喇嘛属下对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鄂康诺（O'Connor）称“多年来拉萨妒忌班禅的权力与尊严。拉萨政府逐步剥夺了班禅从前的几乎所有权力，仅上年就侵占了干霸宗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又公然威胁要进一步剥夺班禅的领地和特权，而班禅则一直反抗拉萨政府的要求。但班禅害怕达赖返回西藏后，无力抵抗达赖对自己的压力”。他询问英国能否给予“道义与物质的支持”。^[7]不知干霸宗为何地，也不知英国是否误指岗巴宗为干霸宗，但是它发现了达赖系统对班禅系统权力的抢夺，原因之一即在于：“虽然长久以来，世俗政权只在达赖喇嘛手中，但是由于班禅喇嘛在宗教上享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因而成为达赖喇嘛的强有力对手。”^[8]

英国政府认为，由于“班禅喇嘛经过西藏时引起的极大激动和崇拜就像基督在欧洲人出现一样”，如果“用极小的价值赢得班禅喇嘛的感情与信任，这样就可

以完成用数百万英镑的代价并通过战争获胜、订立条约和驻扎卫队才能取得的事业”。^[9]于是，英国政府指示鄂康诺出面引诱九世班禅喇嘛，于1905年11月至1906年1月访问印度。在印期间，九世班禅喇嘛会见了英国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后为英王乔治五世）。英国游说“西藏独立”，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九世班禅喇嘛“严词拒绝”。^[10]尽管如此，英国政府的蓄意挑拨九世班禅喇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矛盾，清政府署理亚东关税务司韩德森（Henderson）向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报告说：“班禅在威尔士亲王访印时成了印度政府的客人，并被尊为贵宾。对他的称呼是‘尊贵的殿下’，欢迎时鸣礼炮十起响，由总督贴身保镖护卫，乘四匹马的马车，等等。亲王本人亲自回访，有专列随时供他使用。”“班禅声称，他与印度政府并无政治交涉，我却不能相信。他经常拜访总督，而印度政府政务官员终日进出其下榻的黑斯廷斯公馆。”韩德森又说：“现达赖喇嘛正在返回西藏途中，除非班禅恢复其原有地位而退居札什伦布寺，否则西藏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骚乱。”^[11]英国政府对此极为肯定，在后来的一份文件中说：“肯定的是，班禅喇嘛从未反英”，他“冒着极大的风险”访问印度并会见威尔士，“后来一直珍惜此段回忆”。^[12]

本来在1904年英国军队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夜走内地后，驻藏大臣有泰“请以班禅额尔德尼掌管前藏商上事务，着噶勒丹池巴喇嘛代理”^[13]，但是英国政府的企图，引起清政府的警觉。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根据印度报纸所载，上奏指出：“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此次又诱班禅来印，待以王礼，印报谓英人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劝令班禅请英保护，拒绝达赖，以图独立，惟班禅年少质愚，虽无远志，难保不为所动。”^[14]“印政府遣班禅先回藏，再赴拉萨，胁令藏番拥立班禅为达赖，如达赖回藏，决不承认。”^[15]清政府就此照会英国政府指出：“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16]可见，这时清政府尚无以九世班禅喇嘛取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打算，原因之一就是防止英国利用九世班禅喇嘛。噶厦也批评“班禅前往印度，与英人密谋，不得结果，仍回扎什伦布”^[17]。

为了巩固西南边境，清政府决定推行藏政改革。按照韩德森所说，“中国如欲保持其对西藏之主权……现在已是采取行动之时”以“向印度政府及西藏人证明，驻藏大臣有权实施统治”^[18]。1907年1月13日，张荫棠提出新治藏政策大纲，其中提出改革西藏地方政制：第一，“拟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厚给岁俸，如印度各藩王之制，照旧制复立藏王体制，代达赖专管商上事，而以汉官监视之”。第

二，“拟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体制事权，一如印督用王礼，……设会办大臣一员，统制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无缺，分别治理内政、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宜。其亚东、江孜、札什伦布、阿理、噶大克、察木多、三瞻、三十九族、工布、巴塘等处，酌设道府、同知，均用陆军学堂毕业生，督率番官治理地方，……每有番官之地，应设一汉官。”^[19] 这同传统的政教合一之制显然不同，可以说中央政府设法改革西藏地方制度、使之同内地一样的第一步。

但是到1910年，清政府改变了计划。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大吉岭，一般认为他出逃“之真正原因半系他与驻藏联大人（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不和，半为他极为惧怕前进中之汉人军队”^[20]。实际上，真正原因在于清政府要改革藏政。清政府下令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一面下令驻藏大臣寻找灵童数人，掣签抽出“作为前代达赖喇嘛真正之呼毕勒罕”，一面计划“乘达赖更迭之时机，决取‘政教分离’主意。以后凡关于西藏一切教务，由达赖专司其事；所有全藏之商务、外交，在西藏自治区未设以前，悉由驻藏大臣秉承政府命令相机处治，达赖不得越权干涉”。^[21] 清政府之所以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一是由于“俄国图藏，达赖为俄人所蛊惑，亲信俄国，曾拟赴俄国一行”^[22]；二是清政府推行的藏政改革，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极大反对。清政府见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遭到反对，乃下旨联豫劝说他返藏，但他要求“恢复其名号，并请求除授权他作为黄教领袖处理宗教事务外还授予他处理西藏政治事务权力”^[23]，即是说授予他政教大权，并要求“叙入正式公文”，作为他从印度返回的条件，被清政府拒绝。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正如印度《先锋报》发表评论说：“北京来电，他已被正式废黜，因此他虽能上奏皇帝陈诉所遭受之不公平待遇，要求得到秉公处理，但重回中国则无望。如果他向英国政府呼吁，唯一可能的答复就是中国是在条约规定之权力范围之内行事，因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又说：“对于达赖喇嘛之回归也不会有多高呼声，他本人在喇嘛中也有仇敌，他的出逃对他们是有利的。”^[24] 在此同时，清政府命九世班禅喇嘛“到拉萨主持两藏政教”^[25]，驻藏大臣有泰上奏称：“查班禅额尔德尼自掌黄教以来，整顿地方，悉有条理。当藏印交兵之际，独能镇静不惊，处置裕如。英人回印，曾往后藏谒见，该班禅额尔德尼接晤之下，彼此极称款洽，洵属难得。”^[26] 由此看来，清政府打算以九世班禅喇嘛出面缓和与英关系。

在1909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到西藏那曲时，九世班禅喇嘛前

往迎接，两人相会和好。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时，九世班禅喇嘛属下一部分人认为他也应去印度，理由是“两佛应在那曲相会合好的基础上，再次在印度大吉岭相会，定能消释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方面的前嫌”。另一部分人则建议九世班禅喇嘛先暂住岗巴宗，派人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见后再定行止。九世班禅喇嘛乃派扎色瓦携函前往，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函“表示欢迎班禅来印”，但口头表示“若班禅不能来印时，可在藏中多关照政教事业”。^[27]加上联豫极力劝阻，九世班禅喇嘛乃返回扎什伦布寺。

对于清政府暂摄藏政的命令，九世班禅喇嘛表示“自应谨遵，曷敢妄渎”，但提出“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需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西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有泰认为“江孜现有暂留洋兵，在在均宜防范，所称后藏紧要，自系实情”，同意九世班禅喇嘛“留于后藏，以资震慑地方”。可见，九世班禅喇嘛以防范英国入侵为由“未接受此项命令”^[28]，他不愿打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分别治理前后藏之制。

但是，九世班禅喇嘛1911年2月5日应驻藏大臣联豫的邀请来布达拉宫主持1911年藏历新年仪式，但其“此行目的为会见驻藏大臣”^[29]。夏格巴宣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九世班禅喇嘛住进其夏季住的房屋罗布林卡“感到不快”，对他对驻藏大臣“公开表示亲密，如相伴赴筵或看戏”、挂起与驻藏大臣合影照片更加恼怒，怀疑他欲取代自己的位置。^[30]此外，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双方有一方外出，对方按照惯例要派人问候，提供需要，而“这次达赖逃亡印度时，班禅一方没有派人问候送行、提供用品，这不知是受了驻藏大臣的压力，还是有其他原因”，但“这件事也使达赖一方的人甚为不满”。^[31]噶厦批评九世班禅喇嘛伙同联豫“设法谋夺达赖政教各权”，只是“由三大寺僧及全藏人民反对，不得已仍回扎什伦布”。^[32]不过，此一时期九世班禅喇嘛处理自己与中央政府、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关系的态度，按照暂行代理亚东关税务司事宜的汪曲策忍所说，为：“后藏之班禅喇嘛坚决要求允许他与达赖喇嘛在一起，然汉官立即策略地劝说他去拉萨，使其意图化为泡影，现班禅喇嘛仍在拉萨。汉官告他称，由于他亦甚愿达赖喇嘛返藏，必可使此事得到满意结果。”^[33]正是由于九世班禅喇嘛主张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促使其回拉萨，清政府于1911年2月16日下旨：“此次班禅来见已革达赖乞恩一节，现在达赖是否确系悔过安分自愿回藏？如班禅与达赖消除从前意见，为彼求复执掌，似可乘机体察情形，酌量筹商。”换句话说，清政府也希望两个系统团结。不过，清政府还是希望九世班禅喇嘛执掌大权，疑问“留班禅在前藏暂掌

教务一节，已革达赖所属之噶布伦一行人等是否悦服，彼此可以相安”，要求联豫“就近详慎酌核，从长计议，再行详细奏明，候旨办理”。^[34]

对于上述情况，英国驻江孜、亚东的商务专员麦克唐纳作了另一种叙述。他宣称：“为使人民就范，并委托能为己利用之西藏首领，所以把班禅喇嘛赶快请到拉萨，以便劝诱他代替的位置。结果，他虽然得到拉萨，除非依照中国人的意旨行事外，一切绝不能自主。当时班禅喇嘛认为停留拉萨为不智，所以在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复又转回本寺。他经过江孜时，适巧我正在那里。”^[35]“班禅喇嘛告诉我说，中国人想教他夺取达赖的位置，这是实在的事情，但经他婉辞谢绝。他并且声明，当他同中国的大臣办理交涉时，确曾在达赖的宝座上，但是他明白解释，谓当时没有预备别的处所，所以他只好在那儿处理一切。关于这桩事情，班禅似乎揣想到是中国人设计陷害，班禅喇嘛曾郑重坚决声明，他往拉萨完全是被要挟，他宁愿牺牲性命，亦不愿对达赖喇嘛有不利地方。”^[36]麦克唐纳“很坚强”地要求九世班禅喇嘛“回到札什伦布，静观事态的变化”，宣称“假使这时离开日喀则，未免有倾向中国的嫌疑”。九世班禅喇嘛“考虑一刻后，便决意照办”^[37]。

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麦克唐纳的陪同下回藏，九世班禅喇嘛曾派人要求麦克唐纳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解释误会。十三世达赖喇嘛称虽然双方的部下难免有误会，但其本人对九世班禅喇嘛“绝无芥蒂”。但后来作为噶厦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伦青夏扎对此宣称：“如果班禅和他的大臣对于达赖没有意图，为什么派人前来解释误会？”但是既然英国出面调解，则“无论如何，对于班禅等仍愿以亲善的态度相持”。麦克唐纳乃保证“最近的将来，班禅个人绝无意外危险”^[38]。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伦青夏扎致函麦克唐纳，列举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满意九世班禅喇嘛的几个原因，麦克唐纳有所记述：“（一）达赖喇嘛逃亡后，班禅喇嘛被中国人邀请到拉萨占据达赖的位置，这桩事情自然形同篡窃。但是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中国人在一千九百一十年达赖逃回印度后将他的名位公然褫夺，并请求班禅承继他的位置。班禅喇嘛是很聪明的，将此事拒绝，不过在那时班禅走进拉萨，政治上已铸成大错。他前往拉萨，至少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他对中国人的意见，定有采纳的倾向。（二）班禅喇嘛的重要大臣，有倾向中国的心理。（三）在一千九百零四年荣赫鹏远征队入藏时，班禅喇嘛政府不帮助拉萨‘中央政府’。（四）班禅喇嘛政府拖欠税银约计数万卢比，这些税银是从一千九百零四年积累而成。”^[39]此外，川军将领钟颖被藏军包围，钟颖向九世班禅喇嘛求援，九世班禅喇嘛“曾令白棒寺喇嘛加以接济”^[40]，十三世达赖喇嘛“恶其助汉，罚

银四万两”^[41]。

从上述看出，1888年至1904年“主持反英之中心人物为达赖喇嘛，此英人尤为深切痛恨，日筹对策：乃一面与班禅通款曲，一面乘日俄有事，以兵临藏，达赖战败，出亡青海”。此后至1911年清政府推行藏政改革，驻藏大臣“奏请褫夺达赖名号，令班禅兼理前藏事”。九世班禅喇嘛“本以亲英之故，时受达赖谴责”^[42]，在代摄藏事后“其左右有与达赖旧日亲信争权夺利之事”，终于酿成“双方之嫌怨”^[43]。这些现象，反映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分别治理前后藏之制还能否继续下去的问题。

二、达赖系统、班禅系统之间关系恶化与九世班禅喇嘛出走内地

在清代，“达赖主持前藏，班禅主持后藏，权限确定”，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由驻藏大臣直接监督。其中，班禅喇嘛管辖后藏扎什伦布寺，委任官员治理所属土地和庄园，征派粮税、差役，噶厦无权过问，这“由来已久”^[44]。侵藏急先锋黎吉生挑拨地宣称：“1728年他被封予西部和中北部广大地区的主权。班禅拒绝了这一封予，仅仅接受了靠近扎什伦布寺的一些地方。这就是以一个喇嘛反对另一个喇嘛的政策的开始。给予班禅以世俗权力完全是中国人的事情。西藏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事，而且对班禅的一切封赠，拉萨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的理论，班禅在他所属地区的权力，不过是和封建贵族或大寺院在他们所占有庄园上的权力一样。但中国人却为了他们的利益，使拉萨与扎什伦布之间发生对立，并以给予西藏部分地区的世俗权力和声称他在宗教地位上超过达赖喇嘛等方式，提高班禅的地位。”^[45]另一侵略急先锋麦克唐纳宣称：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分别治理前后藏的制度，是一种“不公平的事体”^[46]。这反映了英国唆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九世班禅喇嘛动手，遂其分裂中国的阴谋。

辛亥革命后，驻藏大臣不撤而撤，噶厦乘机强迫扎什伦布寺服从拉萨统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1914年冬，在日喀则增设基宗（后藏总管）二人，总管后藏16个宗和班禅喇嘛的4个宗（日喀则、江孜、白朗、浪卡子）、30多个谿卡。其二，从1920年起“向班禅辖地征兵、征税征粮、征劳役”。本来，“班禅辖地自清初起即归班禅，其所属各宗、谿及大小寺院的土地、庄园均由班禅札萨委任官吏治理。宗谿收入、寺院财产、赋税徭役等，均由后藏自己管理、经营、支配，噶厦政府原本是无权过问的”。^[47]192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成立军粮局，要求扎什伦布寺缴纳1/4约25万斤之军粮，并要求援引抗英战争时的先例承担

25%共10余万两之军费。九世班禅喇嘛“一再要求免征各项税收”^[48]，噶厦予以拒绝。九世班禅喇嘛的属下刘家驹指责十三世达赖喇嘛仇视九世班禅喇嘛“遇事吹求，苛征不已，致酿成第九世班禅喇嘛离藏之一大原因”^[49]。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采取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恰恰是其推行亲英政策、企图“独立”的时期；这不可避免地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与九世班禅喇嘛产生矛盾，例如：其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亲英的文化教育，给予英人一系列特权，同意英人在江孜开辟租界，九世班禅喇嘛及其属下对此极为不满^[50]；其二，1917年藏军进攻驻扎昌都的川军彭日升部，康藏冲突再起，九世班禅喇嘛属下批评十三世达赖喇嘛“同种相残”，指责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不但“按兵不动，坐视边军瓦解”，而且竟依靠英人台克满调停^[51]；其三，清政府规定藏军额数3000人，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武器的援助下扩编为1.5万人，九世班禅喇嘛批评“扩大藏军违背中央政府规定，乃不义之举”^[52]。

1930年1月14日，蒋致余代表九世班禅喇嘛发表谈话，强调“与达赖失和之主因，则以政治上主张不同之故。班禅夙主归附中央，达赖主亲英，致感情隔阂；加以英人从中挑拨离间，是以积不相能”^[53]。九世班禅喇嘛驻京代表朱福南在1934年6月九世班禅喇嘛北上时更详细地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态度转变，英帝国主义“乘机侵略，助军火经济与达赖，使之叛汉”。“前次藏边之尼泊尔、哲孟雄、不丹三小邦之相继沦没，被英攫去，可为殷鉴。即最近之西藏，经英胁迫利诱，与达赖修订条约，撕毁国防，复将所有学校教育，一律授以藏文及英文，汉文则已取消。至于习惯服饰等，均按英人摹仿。似此英帝国主义之文化侵略，前途殊为危险。再则达赖对汉误于闭关自守主义，汉人入藏境者，多难得其同意；但对英则毫无办法，诚属令人不解。而班禅之主张，总以中央政府为重，因之与达赖政见不合，乃自动离藏，奔走南北，呼吁西陲瞬息之紧急。”^[54]

黎吉生宣称九世班禅喇嘛曾希望英国政府“调解他和达赖之间的纠纷”，英国以“这会构成对西藏内政的干涉”而拒绝。^[55]根据麦克唐纳所说，九世班禅喇嘛两次要求英国调解：1919年，九世班禅喇嘛说“他绝无力量可以供给拉萨政府所苛索的税，因为他管理的藏省断难筹出这样大的款项”，要求“我用我的力量代表他和拉萨政府绝交”。但是，他“似觉得我不相信他”。^[56]1922年，九世班禅喇嘛又提出“居间调处”，麦克唐纳以“印度政府禁止驻西藏的英国代表干预他们任何内政事体”而拒绝。^[57]这反过来说明九世班禅喇嘛确因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英而造成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九世班禅喇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九世班禅喇嘛曾对于“中央政府之救援……望穿秋水”，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西南边疆。1923年10月至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先是要求九世班禅喇嘛派出负责官员前往拉萨就军费一事进行协商。九世班禅喇嘛所派4名官员到达拉萨后即被扣押审讯，除1人外，都被投入监狱。接着，十三世达赖喇嘛“藉请班禅赴拉萨议事为由，派兵三营前往札什伦布”^[58]，“实欲幽囚班禅”^[59]。后藏民众“均力主与达赖战”，九世班禅喇嘛“以达赖背后有英人在，与之战争已难得胜，即幸而胜，英人仍将帮助达赖回藏”，“故不如不战而至内地，尚可减少两藏民众之痛苦”。^[60]时人就此指出：“达赖的大臣曾经几次引诱班禅到拉萨去想加以谋害，而班禅始终不愿意离开扎什伦布。后来达赖亲英色彩逐渐浓厚了，为了拉萨政府的集权，要直接管辖日喀则。换言之，就是达赖要直接消灭班禅在后藏的统治。”^[61]11月15日，九世班禅喇嘛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前往内地。^[62]英国政府认为九世班禅喇嘛是“因对达赖喇嘛不满，而于12月26日逃离日喀则”^[63]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派札萨喇嘛接管扎什伦布寺，直接管理后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间互为师徒之制以及清政府规定的分别治理前后藏制度遭到破坏。

还值得指出的是，双方对失和之因说法有些不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属下把双方失和之因归结于属下的矛盾，夏格巴宣称：“从达赖和班禅之间的私人往来书信，班禅对达赖是高度尊敬的；主要是他的官员和中国人的勾结才把他置于这种不愉快的地位。”^[64]1928年6月，九世班禅喇嘛所派代表阿旺金巴到成都见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长，阐述失和的原因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分别管理前后藏，“人民是同样的崇拜信仰。达赖在前清时，因为背叛朝廷，倾向英人，惹出多少祸事，被朝廷革去达赖封号，逃至印度。同时朝旨班禅兼管前藏事务。至反正后，达赖借英势力回藏，将前后藏川军一律赶走。有英人为他的背景，势力雄厚，两藏政权概受达赖支配。班禅与达赖宗旨不合，藏中遂分亲华亲英两派，达赖对班禅常常勒索重捐。民国十三年达赖受英人愚弄，想铲草除根，谋杀亲华首领班禅，派兵两营，假邀班禅到前藏商议佛教进行，而实欲杀班以行亲英反华的工作。恶达赖而信仰班禅者暗地给信，于是班禅知达赖阴谋，乃假托守静一月（佛规不会客）”，暗地里出走。^[65]对比看来，九世班禅喇嘛一方的叙说符合实际情况。

麦克唐纳对上述情况非常清楚，并施压驱走九世班禅喇嘛。他说：“当这事变最初发生的时候，我曾派人到日喀则问候班禅喇嘛。适巧他回日喀则的那夜，就同重要的侍从和百余扈卫离开扎什伦布向外逃亡。”^[66]英国政府后来说：“班禅喇

嘛只是在到印度避难的请求被拒绝后，才于1923年到中国。”^[67]

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九世班禅喇嘛流寓内地，受到北洋政府和各界的热烈欢迎，深得敬重。他应邀在北京、南京、上海、普陀山、东北、内蒙古各地访游，弘扬佛法，呼吁和平，力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和好，期盼藏事早日解决。1924年5月，他奉大总统曹锟电进京。12月29日，行至西安发出和平通电，呼吁各方停止内战，团结起来统一国家。1925年2月，他抵达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许诺“一俟国内安定，藏事当可迎刃而解”^[68]。3月2日，九世班禅喇嘛向“善后会议”提出五族共和，消弭内战，建设新国家的倡议。1926年9月7日，他致电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望中朝对于西藏仍照从前亲密，使两族人民永久巩固，同卫国家。不图到京以后，适值内讧不息，中枢动摇，至今久困逆旅，欲诉无门”^[69]。北洋政府虽然对九世班禅喇嘛尊崇隆重，从优款待，但因内地战乱，无暇应对西藏问题，故对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一事未能有所作为。能不能解决九世班禅喇嘛返藏问题以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恢复，就留给国民政府了。

第二节 九世班禅喇嘛三次晋京及其努力解决返藏问题

国民党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执政党后，九世班禅喇嘛对其充满希望。为了解决返藏问题，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三度晋京。第一次晋京，1931年5月4日抵达南京，7月6日离开，共66天。第二次，1932年12月14日到达，1933年2月5日离开，共54天左右。第三次，1934年1月24日到达，7月14日回到北平，共172天（其中有66天在杭州、上海）。下面，就先分析一下九世班禅喇嘛自己是如何努力通过三次晋京解决返藏问题的。

一、九世班禅喇嘛第一次晋京与受封“护国宣化广慧大师”

1928年6月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后，九世班禅喇嘛就想晋京解决返藏问题。他在9月2日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函中提出：“今幸革命成功，统一底定实现，三民主义照遍亚洲。而我各省民族同胞早跻极乐世界，独我西藏民族，内受暴政之压迫，外逼强邻之侵略，正处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奄奄一息，仰求我公鼎力扶持，俾我藏民早登衽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僧早拟恭趋政府当道处庆贺革命成功，奈僧随从过多，恐扰道途，有种种之困苦，是以未能遂其志愿”，只能“俟有机会瞻睇崇轅相晤，再当详报隐衷矣”。^[70]英国驻华

公使兰普森汇报：“据报道国民政府于9月底邀请班禅喇嘛到南京，并允诺提供资金，保卫他返藏。”他当即建议英印政府“在印度提供给班禅喇嘛避难所，由此可以预料南京政府会采取什么方式利用班禅喇嘛，从而损害我们与西藏的关系”。英印政府未予采纳，认为：“如果提供避难所，达赖喇嘛肯定会误解。因此，给英藏关系带来的危害更大。”^[71]实际上，谭延闿马上就要卸职，不能回答九世班禅喇嘛的要求。因而，九世班禅喇嘛在1929年1月20日驻京办事处成立宣言中进一步强调：“假使国人视线及政府眼光止周旋于珠江、长江、黄河三流域之间，对于边疆仍旧漠视，则……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计。”^[72]但是，由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接连发生，他无望晋京，感叹：“浩劫未终，战端又起，水旱涸饥之后，又继以兵戈，嗟我子遗，将焉托命？”^[73]因此，他一度向英国驻华使馆提出“要求英国政府帮助解决返藏问题”。使馆回答“英国政府不可能介入两个系统之争，但是很乐意把班禅希望直接转达的消息带给拉萨”^[74]。十三世达赖喇嘛“冷淡地拒绝了这一建议”^[75]。

1929年冬，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之间发生冲突，九世班禅喇嘛计划借机返藏。他派遣代表王罗皆、阿旺敬巴、罗桑坚赞到南京，于1930年4月2日拜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除了“报告此次尼泊尔国侵犯西藏情形”外，还阐述了此次“来京目的”。他们计划等候蒋介石回到南京，“请示应付尼泊尔国方针后再离京”^[76]。在4月7日呈文蒙藏委员会文中，他们要求国民政府简派大员偕同九世班禅喇嘛返藏解决尼藏冲突，提出“敝佛回藏，自须相当卫队，以资护卫。况大敌在前，尤须相当兵力，以张声势”，强调“此种措施，在今日具有实力之中央政府下，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即可将十九年久悬未决之西藏问题统内政、外交而解决之”。^[77]国民政府以和平手段处理边境冲突，九世班禅喇嘛的愿望不可能实现，英国政府注意到原因之一在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担心国民政府会以尼藏冲突为契机，派遣军队护送九世班禅喇嘛返藏，因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南京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尼藏冲突的建议作出了回应”^[78]。

中原混战结束后，九世班禅喇嘛于11月1日致函蒋介石，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时就盼望晋京，然而“不图事与心违，发生许多障碍”，提出既然蒋介石取得军阀混战的胜利，“正解决中藏纠纷之机会也”。他批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少数作恶之人”的蒙惑下“居然违叛中央”，投靠英国，制造康藏纠纷，“虽派代表来京接洽，然事实上未必以诚意倾向中央”；强调他到内地是为了“保护祖国领土、解除康藏痛苦”，要求蒋介石“对于藏事持平处理”，务使他“所抱宗旨得圆满之

结果”。^[79]12月5日，蒋介石复函九世班禅喇嘛，承认“年来国事螭蟾，中原多故，对于边事，兼顾未遑”，表示“现在军事告终，全国统一，自应绥辑边境，巩固边防”。至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派代表的批评，蒋介石认为“前月达赖派遣代表来京，表示倾向，中央政府以宽大为怀，对于西藏事务，正在筹备进行，将来自当体察情形，力求平允”，要求双方团结起来，称“台端与达赖，虽一时少（稍）有误会，仍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御外侮，以纾中央西顾之忧”。^[80]这就向九世班禅喇嘛阐述了通过协调达赖、班禅两个系统关系以和平解决返藏问题的方针。

蒋介石计划于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8月举行西藏会议。前者是为了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该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者是有关各方在一起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因此，蒋介石致电九世班禅喇嘛晋京“咨商边政”^[81]。九世班禅喇嘛表示“决于大会前来京，襄助会务”^[82]。班禅驻京办公处长罗桑楚臣称：中央政府要召开国民会议、西藏会议，九世班禅喇嘛“异常欢慰，故拟于最短期间亲来首都展观，藉聆中藏好音，深愿国家领土从此安如磐石，以增进藏人之幸福，恢复中藏之感情，故派鄙人等先行来京接洽一切。今鄙人等已取得国府同意，不日即赴沈阳报告来京经过，冀班禅佛早日莅临，和平解决藏事，以遂其东来之初衷焉”^[83]。可见，九世班禅喇嘛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请求解决返藏问题，以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正常关系的建议，有电称“关于返藏办法已向中央电商，大体就绪”^[84]。对于九世班禅喇嘛的到来，国民政府认真准备，蒙藏委员会会同参军处及班禅驻京办事处各派三人组织招待处，国民政府“遴派大员，前往欢迎”^[85]。

5月4日，即国民会议召开前一日，九世班禅喇嘛抵达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贺耀组、邵力子及马福祥的迎接。当日下午，他晋谒蒋介石，“祝蒋政躬安康，暨代表西藏民众致拥护中央之意”。蒋介石“答词甚谦抑，希望五族联合，共同建设新中国”。^[86]九世班禅喇嘛“携有西藏产品颇多，分赠中央各要人”，还“拟将留养蒙古之名马百匹，赠送蒋主席，以示拥戴”^[87]。在国民会议上，他又称赞蒋介石“奉总理之主义，竟革命之全功”，强调“班禅蒿目边情，倾诚内款，思启政府之远图，迅拯藏民于涂炭，南北驰驱，心力交瘁”，要求“整顿边境，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国家主权领土之基”。^[88]他向国民会议提出《拟请政府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要求恢复划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固有职权，前后藏行政事务要会商中央政府驻藏长官而行，避免前后藏互相欺侵。接着，他在5月10日召开的

新亚细亚学会会员大会上发表《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除了强调自明朝永乐帝以来“宗喀巴创行黄教，达赖、班禅二弟子即分驻前后藏，掌理藏务”之外，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阐述了前后藏失和之来龙去脉，基本点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在英国政府的唆使下“独立”、制造康藏冲突、向班禅系统施压，导致他不得不出走内地。他要求“从速解决藏务”^[89]。5月13日，他进一步对报界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其行政关系与中国最密切。民国成立以来，中藏间不免隔阂，致行政现象异于旧观。班禅内款陈情，瞬及九载，只以时局未宁，政府未能从速解决藏务，藏康民众在西陲亦睽治化，连年呼吁拯救无方。兹值民会既开，全国代表畅抒伟论，巩我邦基，政府亦不遗边鄙，力求统一。甚愿舆论界本总理济弱扶倾之意，一致赞助，俾西陲民族与中土同享自由平等福利。”^[90]由这些看来，九世班禅喇嘛批评十三世达赖喇嘛媚外“独立”，强调西藏与中国不可分，要求国民政府解决返藏问题，恢复前后藏分别治理之制。

英国政府在1929年时担心达赖、班禅两个系统的公开争吵，会给予中国政府乘机以武力解决班禅返藏问题，因为“事实上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就不断传言提议中国干涉，以维护对藏主权”^[91]。而在这时，它不再有此担心。1931年5月8日，蒋介石宴请九世班禅喇嘛及出席国民会议的噶厦代表，融洽双方关系。5月16日，九世班禅喇嘛呈交解决藏事问题意见书，不再批评噶厦代表来京，而是认为这是噶厦服从中央政府的表现。接着，他提出既然前后藏双方代表均在南京，“机会难得，务请垂念藏民，于最短期间通盘筹划解决藏事，俾班禅得以早日归藏宣示威德”。他进而提出，解决藏事问题之关键在于：其一，对内，前后藏实行分治。根据《训政时期约法》第18条关于蒙藏地方制度“得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而“西藏所谓地方情形者，即前后藏划分与藏务由办事长官掌理是也”。前后藏“有冈巴拉山为界，人情、风俗、言语，截然不同，实难合而为一”。既然要重订西藏地方制度，“自宜参照前清成案，特派熟习边情、著有声望之大员二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夫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其二，对外，国民政府不能承认西姆拉草约，“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政。至中藏主权、领土之关系，则由政府依法订定地方行政制度，英国实无过问之权”。^[92]5月25日，九世班禅喇嘛利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的机会，再次阐述：其一，“黄教在西藏地位，为达赖与鄙人所主持，区域原有一定，同在中国政府保护之下，殊不应有若何纠纷”。其二，“政与教绝对不能分离，若西藏离开政府，即不能自保生存。若政府失去西藏，即不免有唇亡

齿寒之虑”。其三，关于康藏纠纷，“希望政府用政治力量，早日促其解决，俾臻安定”。其四，“鄙人久欲将藏疆情况贡献于政府及全国同胞之前，因频年国家多故，时局俶扰，致未有相当机会。现在中央政府基础已臻巩固，又值国民会议全国代表萃集一堂之期，故特来瞻仰国光，向政府及诸同胞陈述一切，深盼对于边徼人民痛苦特予注意，俾早解除”。其五，“鄙人虽非党员，然确信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唯一良策，故绝对信仰；蒙藏方面，亦当促其共同信仰。蒙藏社会所赖以维持生存者，向为宗教之精神与力量，如更能以总理全部遗教灌注于民族之心目中，并行不悖，则文化定可进展，痛苦悉能解除”。^[93]这样，九世班禅喇嘛阐述了解决返藏问题的迫切心情，再次强调了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方针在于恢复前后藏分别治理之制，但是“主张不用武力，恐有第三者收渔人之利”^[94]，其主张发生了变化。

6月3日，蒋介石指示文官处将九世班禅喇嘛的主张和意见交蒙藏委员会，未表示是否采纳。但6月4日上午，马福祥访班禅“谈一时余，对藏事有所商洽”。九世班禅喇嘛原计划到杭州游览“作罢”，当日下午赴汤山“住三四日，再往宝华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定五日至汤山偕同游览”^[95]。这说明，国民政府难以立刻解决九世班禅喇嘛想要解决的返藏问题。

既然如此，西藏会议召开日期又无限期推迟，九世班禅喇嘛留在南京已无益。5月23日电称，他“拟再留京月余，即返沈，如西藏会议有期，再来京参加”^[96]。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决定授予他一个封号。蒙藏委员会提出：“查西藏达赖喇嘛通达教理，了澈世务，班禅额尔德尼通达教理，行持精严；此次国民会议，均选派代表参加，其拥护热诚，洵堪嘉尚。拟请中央给予达赖以护国普化广慈大师名号，给予班禅以护国宣化光（广）慧大师名号，以示褒荣，而彰诚悃。”戴季陶赞同此主张，称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喇嘛“均精通教理，了澈世谛，在国民会议期中，并皆各派代表列席参加，拥护中央，矢志民国，确属实情”。戴季陶还称：在6月10日的“详细问对”中，九世班禅喇嘛“居心仁厚，陈义忠贞；而对于教理、教义，尤能阐发精微”；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其人，然据班禅所述，修持精严，义理洞澈，亦属不可多得”。因此，他提议：“现在全国统一，允宜各予崇褒，期以赞敷至化，嘉惠黎元。”^[97]蒋介石批示：“先发表班禅称号，达赖暂缓。”^[98]

6月20日，九世班禅喇嘛欢宴戴季陶、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马福祥、外长王正廷、卫生署长刘瑞恒等各院部会长官及蒙藏委员会重要职员共50余人，对

“各方招待盛意”表示感谢。^[99]于是在次日，马福祥呈文行政院：“查班禅额尔德尼此次来京觐见，面陈藏事，并参加国民会议，其拥护中央热诚，洵堪嘉尚。且班禅通达教理，行持精严，康、藏各处喇嘛僧众信仰至深。兹为对于各地喇嘛寺庙宣传中央政令及抚慰信仰佛教民众起见，拟请特派班禅额尔德尼为西陲宣化使，并得在青海、西康两省境内选择适宜地点组织行署，以便办理一切宣化事宜。”这样，蒙藏委员会不但提出封九世班禅喇嘛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进而提出以之为西陲宣化使，组织行署。在所拟《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办法》中特别规定：“西陲宣化使得成立警卫队，任保卫宣化使之责，队长由宣化使遴员呈请派充，教练官由中央派充，所需枪械、子弹、无线电台及长途汽车等，均由中央酌给。”同时提出优待办法，主要是西陲宣化使行署经费定为每月1万5千元，警卫队经费每月1万5千元，九世班禅喇嘛的年俸12万元。^[100]蒋介石批准此办法，但6月22日国务会议讨论时，“比因达赖代表等不无误会”，决议交内政、外交、实业三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审查，“略有修正”。^[101]6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授予九世班禅喇嘛“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的命令。6月29日，蒋介石电示马福祥：“关于优待班禅办法修正，报告下次国务会议后，即由国府发表。至于班禅名号，拟于七月一日在国府举行，照准可以。”^[102]英国政府注意到国民政府授予的名号，并认为“在给予九世班禅喇嘛一笔可观补助费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反英宣传”^[103]。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1931年7月1日举行，是因为该日是国民政府成立6周年纪念日（从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算起）。九世班禅喇嘛致函蒋介石，又一次称颂蒋“奉行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统一华夏，绥靖边陲”，表示自己“惟有求国基之永护，为化治之宏宣，本广舌与慧心，阐宗师之大法，涓埃矢报，肝膈摅诚，以上达主席眷顾之隆，下祝藏境无疆之福”^[104]。国民政府的册文称：“广纳赤宙，知微亦复知彰，有德斯能有众。班禅额尔德尼抚辑藏服，翊戴中央，敷教元黎，效忠党国，实阐党国之妙谛，懋膺无上之殊荣，允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朗烛意珠，奉扬体命。德音普遍，布三民五权之宏规，法铎昭垂，章六度万行之妙用。祇服懋典，益鬯宗风。”^[105]这是他此次晋京的最大收获。

九世班禅喇嘛根据封号典礼的举行及年俸的解决情况，调整离京日期。6月25日，他致电驻平办公处，“谓定七月一日由京来平，谒张学良后赴沈”^[106]。于是，西藏驻京办事处定6月27日为他饯行；这说明达赖、班禅两个系统之间关系在国民政府的调解下有所缓和。在国民政府定于7月1日“举行接受封号礼节”

后，九世班禅喇嘛定于7月3日启程北上，在平停留数日赴沈阳，应张学良之请为张作霖祠堂落成典礼诵经，然后赴呼伦贝尔。^[107]但在7月3日这天，国民政府会议决议：“班禅年俸十二万元，每月办事费三万元，招待费停给。”7月6日，蒋介石致电马福祥解释说：九世班禅喇嘛“其名称仍定为西陲，其年俸办公费亦已决定，且曾与达赖代表磋商，双方似尚满意”。可见，国民政府将宣化使署经费与自卫队经费合并为“每月办事费”，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略有修正”。因此，九世班禅喇嘛于7月10日“妥适离京”北上。^[108]

在7月11日致蒋介石函中，九世班禅喇嘛对第一次晋京做了总结：“自五月晋京，列席国民会议，迨六月施行约法，欣统一之有基，期推行之无疑，私幸观光上国，获益綦宏，乃荷嘉号之特颁，兼奉隆仪之叠沛，五中感激，报称何从……”^[109]尽管如此，要解决返藏问题很难。英国政府就此指出：“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和解尚无什么进展。事实上，达赖喇嘛还下令，如果班禅喇嘛试图返回扎什伦布寺，则一旦他踏上西藏土地，就直接逮捕他。”^[110]

二、九世班禅喇嘛二次晋京与受命西陲宣化使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九世班禅喇嘛在呼伦贝尔。1931年8月12日，他致电南京：“定下月底由呼启程，在国庆节前准可抵京出席四全大会及明春举行之西藏会议。”^[111]8月16日专电称：“班禅定双十节以前过平来京，出席四全大会，俟出席西藏会议后再定行止。西藏会议原定今年秋季举行，现以筹备不及，特改至明春开幕。”^[112]9月11日，他致电南京：“定一周内离呼伦赴沈，约十月初到京，参加四全大会并商决西藏问题。”^[113]9月底，他西行，但是未于10月初抵达南京。而是于月抵达东乌珠沁旗，11月到西苏尼特旗，1932年3月起在百灵庙“建法坛念经，祈祷和平，并追荐抗日救国献身将士，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14]。

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要求九世班禅喇嘛再次晋京。1931年10月13日，戴季陶致电：“敌兵压境，国事危急，此时惟有全国各族同胞消释嫌怨，亲爱团结，以和平公道之诚意一致御侮，方克有济。”“大师爱国爱民，务恳对于满族各同胞切实教导，使之拥护中央，造成真正统一，为自救救国之道。并恳事竣早日回京，共商一切，不胜感盼之至。”^[115]同日，蒙藏委员会也致电：“沈变发生，时以为念。现在国事危急，满蒙接近强敌，务盼切实劝导，使边地人民均知拥护中央，以图自救，万勿受人利用。并盼事竣早日回京，共商一切。”^[116]同时，日本煽惑九世班禅喇嘛，这一阴谋活动及他的明确态度，在他1932年3月4日《请安抚蒙民通

电》中体现出来：“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方离间，播散谣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禅蒙政府待遇优容，自愧涓埃之报，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受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117]这也反映出国民政府要求他再次晋京的又一原因，是担心他被日本煽惑。

九世班禅喇嘛曾经打算不晋京就解决西陲宣化使公署的设置问题，进而解决返藏问题。1931年11月5日，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将“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之印”发交蒙藏委员会转送给他。1932年2月24日，罗桑坚赞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长的身份将此印送到九世班禅喇嘛手中，他“遵于是日启用”^[118]。但是，国民政府考虑到达赖系统的反对，未发给西陲宣化使印玺。九世班禅喇嘛对此不满，在3月19日致行政院电中强调：“班禅以西藏垂危，冒险东来，原冀政府拯救，何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忽忽九稔，内蒙五载，人地虽属相安，水土终有未宜。自抵吐呢特（苏尼特右旗？）后，青海代表相继来请，已允西行。惟客岁晋京，政府优遇班禅。另饬西陲宣化，迄今文件各项，留中待发。此行应恳给领，以资信守，是所切禱。”^[119]收到此电文后，蒙藏委员会于3月21日呈文行政院转国民政府：“查二十年七月国民政府会议曾经议决界班禅大师以西陲宣化使名义，但为时数月，迄未发表。拟请钧会转呈政府将此项名义早日发表，在班禅大师未能回藏以前，指定青海香尔德为其驻锡地点，并通令地方长官妥为保护，则边疆人民因对班禅大师信仰之故，亦可坚其内向之心，党国前途，利赖实深。”^[120]4月14日，国民政府照准。4月20日，行政院向青海、西康下达特派九世班禅喇嘛为西陲宣化使的命令。4月22日专电称：“班禅允就西藏宣化使，使署将设西宁。”^[121]在此期间，蒙藏委员会派陈敬修“到青海宣传中央德意”，青海各寺庙喇嘛等联名致电“拥护中央，西陲极呈佳象”。^[122]8月22日，罗桑坚赞称：“班禅现在内蒙，定十月间应平佛教会约赴平讲经，年底赴青海转西藏。”^[123]换句话说，九世班禅喇嘛并不打算晋京。10月9日，他致电其驻京办事处，称自己“拟在北平就任西陲宣化使职，并组织宣化使署”，指示该处“草拟组织大纲呈请核定公布，以便早日实行组织，进行宣化事宜”。^[124]10月19日，驻京办事处将组织大纲呈送蒙藏委员会。

9月中旬，达赖系统、班禅系统双方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等致电南京，反对九世班禅喇嘛返藏。电文首先强调，在国民政府“派员入藏宣达德意、代表等来京接洽”之际，却发生了康藏纠